

社会记忆视角下的南京城市街巷地名变迁

纪小美¹, 崔会芳¹, 陶卓民^{2*}

(1. 南昌大学旅游学院, 南昌 330031; 2.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 论文以南京主城区为例, 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社会记忆理论, 探讨街巷地名变迁的时空格局与动因机制。研究发现: 新增地名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外围, 消失地名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内部。老城南既是现存街巷地名密度最大, 也是消亡强度最大的地区。新增地名在20世纪50—80年代集聚于下关区沿江地带与明城墙内的老城区, 90年代以来散布于老城区外围。民国开始政府成为命名主体, 政府主导性与企业自主性不断增强。现存街巷以周边民居、祈愿祝福、异域文化和山水地物类为主要命名依据, 既传承老城区的命名传统, 也体现新城区的发展理念。宗教信仰、历史人物、经济活动、市政设施、自然方位类地名易随社会意识形态与城市功能空间的转变而消亡。权力与资本的介入催生大量新式地名, 记忆的惯性延缓了老地名的消亡, 记忆的社会建构性驱动地名的演进。

关键词: 街巷地名; 时空格局; 变迁机制; 社会记忆; 南京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快速城镇化与市场经济的浪潮, 全国地名格局发生剧变。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至少有近5万个乡镇和46万个建制村的名称被废弃, 同时每年新生各类地名在2万条以上。2007年第24次联合国专家组会议将地名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并指出: 地名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与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地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名的消亡意味着部分传统文化的流失。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也积极响应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上表示: 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 进一步做好“乡愁”这篇地名文化建设文章。然而, 纵观历史发展, 地名的稳定是相对的, 地名的变迁是必然的。在当前全国城市改造与更新的浪潮中, 掌握城市地名的变迁规律与社会选择机制, 了解不同社群的地名使用偏好与文化诉求, 对于历史地名的

科学传承与现代地名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开始运用批判范式, 探究不同社群或阶层在资本、权力与认同驱动下, 对地名符号资本的争夺与协商, 重点是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审视地名变迁, 剖析地方意义的建构与重构的机理动因, 产生了批判地名学(Rose-Redwood et al, 2010)。其研究内容以权力关系、地方认同、空间政治、地名商业化为主(David, 2012; Shoval, 2013; Light et al, 2015), 研究尺度以城市、街区为主; 研究对象涵盖执政者、投资商、精英阶层、普通民众等多方利益主体。虽然近期内亦学者借鉴了批判范式, 探讨了景区、街巷、城市与海岛等地名的文化内涵、权力关系的演变及其社会响应(刘博, 2014; 李鹏, 2015; 陈冠琦, 2016), 但仍未脱离“地名在区域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中具有‘证据’或‘记忆’功能”(吴俊范, 2013)这一前提。只是关注的焦点不再限于地名符号的本身, 而是拓展到对命名与更名的过程探讨, 地名的“证据”或“记忆”功能不再是静态的与被动的, 而是动态的与主动的

收稿日期: 2018-12-25; 修订日期: 2019-01-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840019)。[Found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18YJC840019.]

第一作者简介: 纪小美(1988—), 女, 福建福清人, 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与旅游地理学。E-mail: zhangyuge20105@sina.cn

*通信作者简介: 陶卓民(1963—), 男, 江苏苏州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E-mail: taozm@tom.com

引用格式: 纪小美, 崔会芳, 陶卓民. 2019. 社会记忆视角下的南京城市街巷地名变迁[J]. 地理科学进展, 38(11): 1692-1700. [Ji X M, Cui H F, Tao Z M. 2019. Changes in Nanjing street n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Progress in Geography, 38(11): 1692-1700.] DOI: 10.18306/dlkxjz.2019.11.005

(Azaryahu, 2011),即开始关注地名的权力意识、社会功能、指称地域、文化内涵与命名主体等方面的演化折射出的社会关系的变迁(纪小美等, 2015; 张超亚, 2015; 韦谢, 2016)。

地名学的学科地位较为边缘,以致被称为冷门绝学,亟待振兴。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信息科学与管理学等相关学科背景的学者,各自借助专业优势参与地名学研究,但目前仍缺乏社会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应用。尤其地名作为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重要产物与构成要素,意味着社会记忆理论对于深化地名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一,社会记忆兼具的传递性与连续性、当下性与选择性(Halbwachs, 1992; 康纳顿, 2000),决定了在地名命名与更名过程中,既不能忽视当地居民使用习惯与集体记忆,也不能无视社群对地方未来身份的集体想象(Borer, 2010),即应兼顾地名的实用性、传承性与时代性等多重效益。其二,社会记忆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协商、共谋与建构过程,这一特性已鲜明地体现在现代地名命名过程中,民间、政府与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与多维价值观的介入,因此,社会学倡导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民族志等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地名研究借鉴。

作为首批入选历史文化名城的南京,其地名文化底蕴深厚,也是全球第一座把历史地名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城市。2008年以来,南京市已将112条历史地名纳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政府与专家纷纷呼吁城市新建项目启用或沿用这些历史地名。1980年以来南京政府部门开展了3次地名普查,摸清辖境中各类地名的基本情况,逐步完善了市、区县2级地名档案。鉴于研究区域的典型性,数据的可获得性与相对完整性,本文以南京主城区的街巷地名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与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探讨南京街巷地名变迁的时空格局及其动因机制,以期给予南京等历史文化名城地名文化的科学保护与传承以启示。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南京主城区(包括鼓楼区、玄武区、白下区、建邺区、秦淮区、下关区和雨花台区,下辖51个街道、河西新城和雨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街巷地名为研究对象。以南京城区电子导航地图为数据地图参考,借助南京地名公共查询系统(<http://223.4.21.2:8981/#>),获得街巷地名的沿革与命名依据,利用ArcGIS 10.2的空间统计与制图模块进行街巷地名空间数据库的建立与专题地图的制作。

消失的历史街巷地名从各区的地名志、历史地图、城市规划档案等资料中收集整理,由于受可获取的资料与研究精力所限,难免有数据遗漏,但研究样本充足,来源权威,因此,研究结果仍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在探讨街巷变迁的时空格局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具体详见相关研究(宋晓英等, 2015),此处不再赘述。但需要特别指出,街巷为线状地物,其地名多视为点状,为突出地名数量的空间变化,采用以下处理方法:若某一街巷不超过某一面状街道范畴,就取其中心点位置标志地名,若某一街巷穿越多个面状街道,就用这些街道将该街巷拆分成数段,再取各段中心点位置标志相同地名。收集到的主城区现存街巷地名1075条(其中定名年代不详的18条)。以1949年为界,在此之前定义为历史地名,在此以后定义为现代地名。

2 南京主城区街巷地名的时空格局

2.1 时空分布差异

(1) 时间分布。民国以来南京主城区内新旧地名的消长不断进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驱使街巷地名变迁更为剧烈,民国时期形成变迁的次高峰。保留下来的历史街巷地名457条,其中明代以前14条,明代94条,清代162条,民国187条。新增现代街巷地名600条,其中计划经济时期(1950—1978年)新增133条,市场经济时期(1979年以来)新增467条,又以1990年以后的405条占绝对优势。260条消失的街巷地名中,明代以前2条;明代15条;清代15条;民国时期105条,并集中在1930—1938年和1946年,与这一时期南京的首都建设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期间消失29条,市场经济期间消失94条,又以1990年以后消失的81条为主。

(2) 空间分布。截至2015年底,南京主城区的现存街巷分布如图1所示。明城墙范围内的老城区既是现存街巷地名密度最高,也是消亡强度最大的区域,其次是白下区与秦淮区的西部(图1、图2)。现存街巷地名高密度区呈南北向延展态势。由图2可知,消亡地名集中于老城南(以夫子庙为核心,东西至城墙,南至中华门,北至白下路,是南京城市人

口最密集地区),消亡强度表现出距离衰减规律。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带来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南京市也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几乎每个街道均有较大规模的住宅被拆迁安置(宋伟轩等,2013)。消失的街巷地名中,白下区占33.6%,以朝天宫(42)和洪武路(29)街道为甚;秦淮区占31.6%,以双塘(41)和夫子庙(21)街道为甚;鼓楼区、玄武区、下关区、雨花台和建邺区分别占到2%~13.5%。历史地名消亡的同时新兴地名不断涌现。1950—1989年与1990年以后,这2个时期增加的新地名,无论在数量还是结构上均差异显著。新增街巷地名在1950—1989年间呈片状集聚集中于下关区的沿江地带与老城区内(图3),在1990年以后呈团块状散布于老城区外围地区(图4),主要与不同时期城市建设重心的迁移有关。

2.2 类型结构差异

将现存的街巷地名按命名主体与反映客体进行划分,得到表1、表2所示的地名类型。中国历史上正式的国家政权组织仅达到县及其以上的行政单元,受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规模的限制,县以下的各类地名一般由民间约定俗成,再经过乡绅等精英阶层的承认或改造,最后上报官方获得认可。由表1可知,封建时期定名的272条历史街巷地名中由民间约定的超过99%,政府命名的不足1%;民国时期定名的历史街巷地名185条,政府命名开始超过民间约定,企业自主命名现象初显,民国前一些知名度较高的老街巷名称沿用下来。1950—1989年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经济初期,政府命名占优势,民间约定的比例较前期下降明显。城市路网密度加大,命名的序列化倾向显现,支路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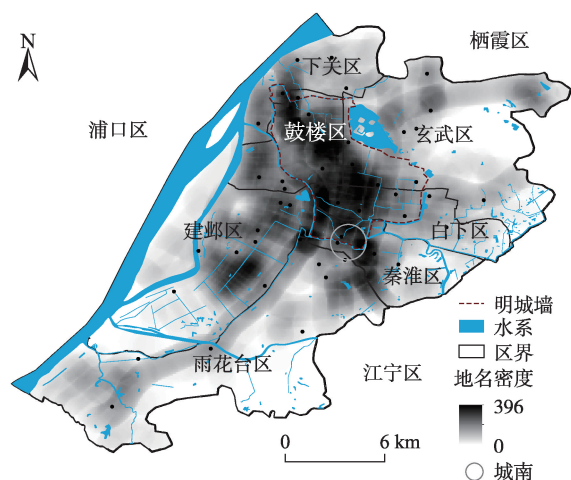


图1 现存街巷地名的分布格局

Fig.1 The distributing pattern of existing n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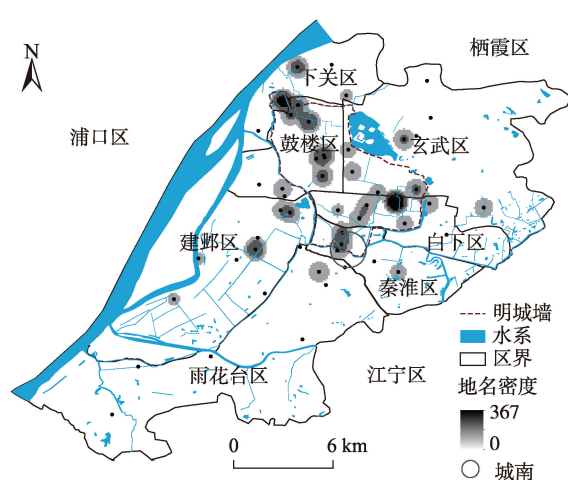


图3 1950—1989年新增街巷地名分布格局

Fig.3 Distribution of newly-added names, 1950—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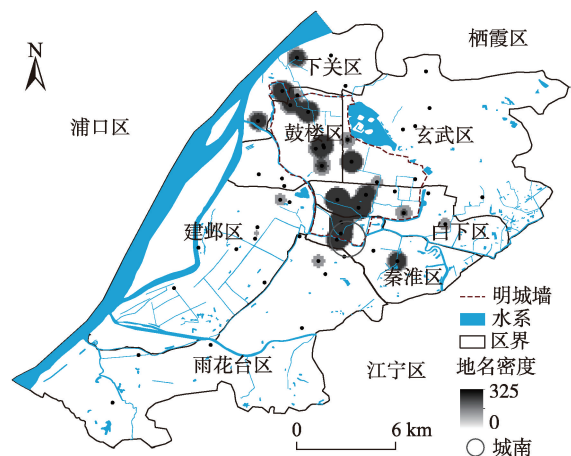


图2 消失街巷地名的分布格局

Fig.2 The distributing pattern of disappearing n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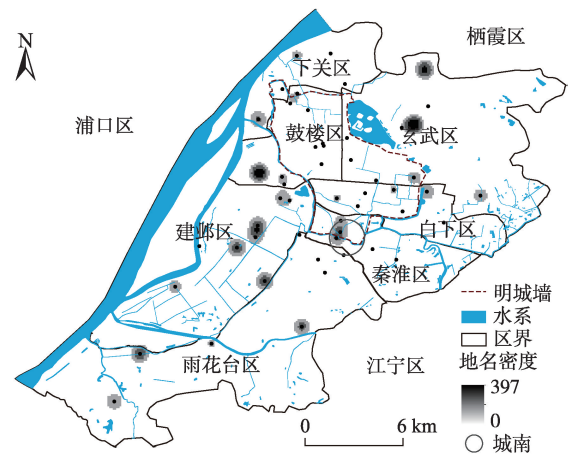


图4 1990年以来新增街巷地名分布格局

Fig.4 Distribution of newly-added names since 1990

表 1 南京主城区地名命名主体变迁
Tab.1 Changes in naming subject of street names (%)

命名主体	封建时期	民国时期	1950—1989 年	1990 年以来
民间约定	99.26	45.08	30.16	17.07
政府命名	0.74	51.30	54.50	51.37
企业命名	0	0.52	3.70	18.59
地名沿用	0	3.11	11.64	12.97

用干道名称,老街巷地名沿用率较前期增幅显著,同时企业自主性进一步提升。1990 年以来大规模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政府成为最重要与影响力最大的命名主体,企业命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由表 2 可知,现存街巷地名中,以自然方位与周边民居命名的比例均超过 10%,其次为祈愿祝福、异域文化与市政设施命名的比例,均超过 8%;比例超过 5%的还有经济活动和山水地物类,上述 7 种类型占现存总数的 70%。该类型结构一方面传承了老城区的命名传统,另一方面也很好契合了“居住与就业兼顾的中高档居住区”和“以滨江风貌为特色的城市西部休闲游览地”的新城区的发展理念。市政设施又以桥梁、城门居多,这与南京作为江南水乡与六朝古都的自然与人文风貌密切相关。明清时期保留下来的经济活动类地名与近现代新增的数量相当,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南京老城区繁华的商贸场景,是古代典型市井文化的表征。以山水地物命名的地名,其指向性强且稳定性好,符合地名实用性标准,因而这类地名保留的概率也较大。

消失的街巷地名以经济活动、市政设施、自然方位类为主,三者共计占总数的 43.5%。比例超过

5%的还有宗教信仰、历史人物、祈愿祝福和居民姓氏。经计算发现,现存与消亡地名的类型比例的相关系数为 34%,通过 0.0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类型地名的消亡与增加存在一定的同步性,一般基数越大的某类型地名其消亡的规模也越大。由此推测,人们对地名变迁的响应倾向于顺其自然。原因在于,空间实体(物质)变迁是地名(意识)变迁的客观动力。尤其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交通工具越发被速度更快、体量更大的机动车代替,使得原本几百米甚至几十米就一个地名的道路指称系统的实用性下降。城市道路的拓宽延展使得一些老街巷地名在合并或改造过程中随着空间实体的消失而湮没。统计到这类街巷地名 141 条,最终合并成 48 条新道路名称。

3 街巷地名变迁的机理探讨

3.1 权力与资本的介入催生大量新式地名

社会记忆理论认为,权力关系在社会记忆的构建、维系与传递中起到重大作用。正如福柯来所言,记忆是斗争的主要筹码之一,控制了人们的记忆就等于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络,因此,最好的办

表 2 现存与消失地名的类型比例
Tab.2 Rates of existing and disappeared street names (%)

反映客体	现存	消失	反映客体	现存	消失
宗教信仰	3.79	6.64	居民姓氏	4.16	6.64
政府机构	2.04	1.95	祈愿祝福	9.44	5.47
山水地物	6.48	4.25	教育科举	1.30	1.95
经济活动	7.96	18.48	周边民居	16.47	1.56
政德教化	2.87	3.91	自然方位	13.78	9.38
历史人物	3.98	5.08	字音讹变	1.30	4.34
军事防御	2.96	3.13	历史典故	1.39	1.17
市政设施	8.08	15.67	地形地势	0.83	1.56
地方特色	2.31	2.73	名人故居	0.19	3.91
异域文化	8.70	1.17	风景园林	2.00	1.00

注:数据来源于南京各区地名志、中华民国《首都计划》《南京通志·地名卷》《南京市古今地名对照表》等。

法就是占有它(记忆),控制它,管理它(Jeffrey, 1998)。现实社会中,主流文化往往控制着社会的记忆资源,而对异质文化采取压制态度。离开空间的权力往往无法运作,执政阶层的意识形态也必须借助空间才可再生与蔓延(Foucault, 1986)。街路作为城市中渗透力最强的公共社会空间,从有形的道路、路标到无形的路名,无不在国家权力的管控下(张超亚, 2015)。某类地名指称的道路,其规格等级与其渗透的空间层级的差异正是这类地名的命名者的权力空间表征。正如胡箫白(2010)的研究发现:民国期间南京为彰显“孙中山”一词的“政治符号”意义,出现了大量以“中山”命名的城市功能空间。这些地名不仅依赖于符号的信息传达功能,更通过空间定位与功能区划分,加强了该符号的存在感,使整个南京城与中山纪念空间高度重合。现存以中山命名的街路5条,包括中山路、中山南路、中山东路、中山北路和中山门大街均为城市东西向主干道。

市场经济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街巷地名景观的变迁不仅体现出国家治理技术对城市空间上的重构,也隐含着资本带动下的经济优先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绝对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市迎来了快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的旧城改造,到21世纪初的河西新城、雨花台经济开发区的重点建设,资本都是重要的手段和驱动力。尤其,在旧城改造过程中的“以路带房,以房补路”方针,较好地克服了道路系统改造与更新所面临的政府财政不足问题(张超亚, 2015)。借助房地产的开发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资本要素极大地推动着城市化。一方面体现为1990年以来大量涌现以房地产、企业品牌或其创立者自主命名的,政府规划的序列化、主题化的街巷名称。例如以雨润食品公司命名的雨润大街,以梦都卷烟厂命名的梦都大道,以房产小区命名的街巷超过50条;再如,2011年秦淮区红花街道出现以“金”字为首字的路名系列(金源路、金茂路、金品路等),寓意经贸繁荣发达,营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有利于招商引资。另一方面体现在街巷等级的变化,传统街巷与乡野小道转变为现代化的商业大街、步行街、绕城公路、快速通道等,既预示着街路功能的转变,也反映出资本助力下城乡土地利用与功能空间的转换。

3.2 记忆的惯性延缓老地名的消亡

惯性是社会记忆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以往

相关研究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对民众地名使用态度的影响,而忽略了“习惯和熟悉也决定着情感表达与体验”这一重要原理(Edensor, 2012)。Rose-Redwood(2008)和Light等(2014)发现,习惯这一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19世纪末的纽约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期的旧地名被持续使用的原因。技术层面上,地名往往以地理实体要素作为参考,如果街巷空间的改造没有变更原地名所指示的方位与空间形态,老街巷地名在记忆惯性的作用下一般可以延续下来。例如,南京城区中大量以桥命名的地点原来是一个点状要素,后来人们以之命名线状的街巷,它们成了一个线状地名。虽然某些桥已不复存在,但是人们要辨认的是线状地物,不会出现空间辨认的混淆。价值层面上,一方面,老地名的沿用可降低社区适应新地名的社会成本。街巷道路是一个城市的基本骨架,其名称不仅直接指称城市街路,具有重要的定位意义,而且是城市中许多其他类型地名的重要参考,涉及交通、消防、邮政、工商、户籍、房产等纷繁复杂的社会运行体系,频繁更名必然增加后续的管理难度,增加适应新地名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老地名的沿用可维持其积淀的符号资本。许多街巷地名起源于民间传说,本地居民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正是延续和再生产社区的传统价值取向与道德理念的重要载体,具有很高的社会资本价值;此外,一些已注册成为商标的老街巷地名拥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与社会记忆理论认为的“过去成为群体表述利益的有用资源”(Schwartz, 1996)不谋而合。民国以来政府虽然主导了命名权,但很大程度上也沿袭着民众的命名习惯。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南京政府对城市道路地名进行分区规划和保护,老城区许多新道路仍沿用老街巷名称,沿用率超过10%。例如,继续沿用了三国时期的乌衣巷、丁官营,唐代的水斋庵,宋代的泥马巷、长乐街和钓鱼台等老地名,并且基本保持了原街巷的基本格局(岳升阳等, 2012),使得沿用下来的老地名因实用性较高而延续其生命力,从而起到传承老城区历史文化的重要作用。

3.3 记忆的社会建构性驱动地名的演进

地名的演进是历史必然过程,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驱使地名处于相对稳定与变更的交织运动中。城市不仅需要传承地区的历史文化,也需要引领地区发展的未来。记忆的社会建构性表明记忆是立足于现在或未来的利益而对过去的一种建

构(Halbwachs, 1992),是一个不断借用与选择的过程。政府以其想象的地方形象来规划地方,运用其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去塑造新的城市形象与新的地方认同;普通民众则借助地名的日常空间实践,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下去记忆或遗忘地名。

(1) 借用过程。现代城市的地名文化大量借用异域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末上海出现的以中国行政区名称及其空间分布设计的街路地名系统,改革开放以后,该地名系统被诸多城市仿效。从积极意义上讲,这种命名风气极好地彰显现代城市包容开放的时代精神。由表2可知,现存街巷地名中有8.7%借用了异域文化。南京市政府以其想象的地方形象来规划地方,塑造包容开放、发展有序的大都市形象。例如2005年全国“十运会”在南京河西地区举办,为迎接此次盛会,河西新城新建的53条城市快车道和主、支干道路均引用祖国名川命名,寓有海纳百川和喜迎八方宾朋之意。

(2) 选择过程。记忆正因它的选择性而闻名(鲍曼等, 2002)。地名命名是选择性记忆过程,地方被赋予新的意义,地名亦成为地方的象征性资本。城市不断更新改造,新记忆取代旧记忆。社会发展对地名进行选择,客观动力在于地名实用性的时代变迁,不实用的地名一般会在日常空间实践中被逐步淘汰。由表2可知,经济活动、自然方位、居民姓氏类的老街巷地名消失规模最大,原因在于传统商贸活动集中于老城南,这里也是旧城改造的重点区域;此外,级差地租规律驱使下,城市经济业态与地域结构不断更替,古代经济活动类地名多已名存实亡,在当代大量消亡是难以避免的。现代城市功能空间的差异直接推动古代市政设施类地名的消失,尤其自然方位类地名亦须不断变更以更好地指示城市日新月异的交通格局。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维系,人口聚居地大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姓氏来命名(张鸿奎, 1995),但在商品经济与城市化浪潮中这种社会组织结构逐渐消解,以地缘或业缘为纽带的多姓氏杂居成为城市社会组织的主流方式,因此,以居民姓氏命名的街巷地名也容易消失。

(3) 求美求雅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地名符号资本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声望提升是推动社会发展对地名进行选择的主观动力。地名不是消极表达意义的文字,地方的命名在生产“地方”的过程中植入了社会文化意涵,地名亦可参与地方的生产实践中,具有积极的社会能动性(Azaryahu, 2011)。

例如,民国时期的“破除偶像”与解放初期的“破四旧”运动对民间宗教信仰产生巨大冲击,宗教实体空间的大规模销毁或改造引发与其相关的街巷地名的消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社群对地名的内涵有了新的要求。城市管理者要求通过地名的信息传递,提高地区的知名度,发展地方经济,希望使用那些能够反映当地建设成就、发展远景、投资环境的词汇来作地名,地名与经济建设挂钩,成为投资环境的一部分。随着住房商品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房地产开发商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在价值规律的推动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不断增强,为开辟市场、获得利益,常视地名为其获得利润的手段与工具,将寓意美好、文化品位较高的楼盘地名作为其产品走向市场重要的形象包装之一。消费者不仅对住房质量与舒适度的要求不断提升,客观上对住房环境、居住品味尤其是文化品味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人们希望用祈福、优雅、美好且又有一定文化、艺术水准的词汇命名居住地,地名也就成为居住环境的一部分。而现存街巷地名大量以周边民居(主要为现代商品住宅小区)、祝愿祝福、山水地物命名,正是对这种主流社会文化心理的生动反映。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南京主城区为例,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社会记忆理论,探讨街巷地名变迁的时空格局与动因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时间分布上,民国以来南京主城区的新旧地名呈现大规模消长态势。新增与消失地名在空间上呈互补格局,前者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外围,后者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内部,与外围的新区开发及中心的旧城改造密切相关。人口密度最大的老城南既是现存街巷地名密度最大,也是消亡强度最大的地区。新增地名分布比较广泛且时代差异明显:20世纪50—80年代呈片状集聚于下关区沿江地带与老城区,90年代以来呈团块状散布于老城区外围。

(2) 封建社会时期,民间是地名命名的主体;民国时期,政府的主体地位开始超过民间,企业自主命名现象初显;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经济初期,政府的主导性进一步增强,民间作用下降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中,政府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企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现存街巷的命名以自然方位、周边民居、祈愿祝福、异域文化和山水地物等为主要依据,既传承老城区的命名传统,也体现出新城区的发展理念。消失的街巷地名类型中,宗教信仰、历史人物、祈愿祝福等易受社会意识形态的时代变迁而消亡,经济活动、市政设施、自然方位等容易随城市功能空间的转换而消亡,同时随着城市社会组织方式的更替,以居民姓氏命名的街巷地名也容易消失。

(3) 权力与资本的介入催生了大量以房地产、企业自主命名的,政府规划的序列化、主题化的街巷名称,这类地名日益主导城市地名文化的景观格局。记忆的惯性起到延缓老地名消亡的作用。原理在于:其一,实体空间虽变更,但旧地名的指位性较强而延续其生命力;其二,新地名的适应需要付出较大的社会成本;其三,老地名蕴含一定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沿用这类地名有助于维系其积淀的符号资本与维系居民的地方认同感。记忆的社会建构性驱动街巷地名的演进,城市地名文化变迁是一个不断吸纳外来文化与迎合时代诉求的过程。社会发展对地名进行选择,客观动力在于地理空间实体的变迁引发的地名实用性的变化;主观动力在于求美求雅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地名符号资本价值。

综上,要实现现代城市语境中历史地名的科学传承与现代地名的协调发展,需要加强城市规划、邮电通讯、公安户籍、科教文卫等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需要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规划学、管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合作,做到地名规划不仅满足城市发展需要,而且可以引导城市未来发展与延续城乡文脉,发挥地名在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层面上的多重效益。例如,街巷等地名的命名与更名应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标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应尽可能传承原有地名系统中的合理成分与地域特色,尊重居民的文化审美与使用习惯。可将消失的老地名纳入中小学生的地方历史、地理课本,让当地学生接受地名文化教育,增强地方感和文化自豪感;可在城市旅游的宣传介绍中增加历史地名内容,使地名成为展现地域风采的一张名副其实的文化名片。

未来研究可将街巷地名及其变迁的最直接受众与日常实践者——社区普通居民作为重点对象,采用小尺度的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等手段(纪小美, 2016),探讨日常生活语境下,当地民众对政府或开

发商所提出的地名方案的反应及响应,为城市地名的民主管理与权利协调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保罗·康纳顿. 2000. 社会如何记忆 [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40. [Konnton P. 2000. How the social remember. Translated by Naran Bilik.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People Press: 40.]
- 鲍曼, 欧阳景根. 2002. 流动的现代性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3-24. [Bowman E, Ouyang J G. 2002. Liquid Modernity.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Sanlian Book Store: 23-24.]
- 陈冠琦, 张争胜, 赵静, 等. 2016. 南海诸岛地名的权力关系及地方反馈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 88-95. [Chen G Q, Zhang Z S, Zhao J, et al. 2016. Relationship of power and local feedback of place nam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 88-95.]
- 胡箫白. 2010. 民国时期南京地名的文化与政治解读 [J]. 中国地名, (3): 15-22. [Hu X B. 2010.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n Nanjing Place-name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China Place Name, (3): 15-22.]
- 纪小美, 陶卓民, 李涛, 等. 2015. 近代以来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研究 [J]. 城市发展研究, 22(11): 101-108. [Ji X M, Tao Z M, Li T, et al. 2015. The study on spatial politics evolution of place-name in Fuzhou City since the Opium War.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2(11): 101-108.]
- 纪小美, 王卫平, 陈洁, 等. 批判转向以来地名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7): 910-919. [Ji X M, Wang W P, Chen J, et al. 2016.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oponymy research since the 1980s.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7): 910-919.]
- 李鹏, 封丹. 2015. 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 以从化温泉为例 [J]. 人文地理, 30(2): 58-64. [Li P, Feng D. 2015. The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Changing place name and reproduction of meaning for Conghua Hotspring. Human Geography, 30(2): 58-64.]
- 刘博, 朱竑. 2014. 批判视角下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研究 [J]. 地理科学, 34(9): 1139-1144. [Liu B, Zhu H. 2014. Naming and renaming: A critical study on Guangzhou metro station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4(9): 1139-1144.]
- 宋伟轩, 陈培阳, 徐昀. 2013. 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剥夺式重构研究: 基于南京 10843 份拆迁安置数据 [J]. 地理研究, 32(8): 1467-1476. [Song W X, Chen P Y, Xu D. 2013. Research on the deprivation-type reconstruction of inner-city registered poverty space based on resettlement data of Nan-

- jing. *Geographic Research*, 32(8): 1467-1476.]
- 宋晓英, 李仁杰, 傅学庆, 等. 2015. 基于GIS的蔚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分析 [J]. *人文地理*, 30(3): 79-84. [Song X Y, Li R J, Fu X Q, et al, 2015.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analysis of Yuxian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GIS. *Human Geography*, 30(3): 79-84.]
- 韦谢. 2016. 城市地名变迁与社会记忆的建构: 基于《紫堤村志》的分析 [J]. *中国名城*, (3): 53-56. [Wei X. 2016. The change of urban place na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Ziti Country Annals. *China Ancient City*, (3): 53-56.]
- 吴俊范. 2013. 城市区片地名的演化机制及其历史记忆功能: 以上海中心城区为例 [J]. *史林*, (2): 15-26. [Wu J F. 2013. Self-evolution mechanism of urban-areal place names and its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Downtown region. *Historical Review*, (2): 15-26.]
- 岳升阳, 田鹏骋. 2012. 北京旧城改造中的地名保护问题 [J]. *城市问题*, (10): 98-100. [Yue S Y, Tian P C. 2012. The issues of place-name protection during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in Beijing. *City Problem*, (10): 98-100.]
- 张超亚. 2015. 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研究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31(4): 83-88. [Zhang C Y. 2015. Study on urban road name evolution based on the city evolvement: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31(4): 83-88.]
- 张鸿奎. 1995. 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 [J]. *史林*, (3): 86-92. [Zhang H K. 1995. Immigrant and the changes in Shanghai place-name. *Historical Review*, (3): 86-92.]
- Azaryahu M. 2011. Rabin's road: The politics of toponymic commemoration of Yitzhak Rabin in Israel [J]. *Political Geography*, 30: 1-10.
- Borer M I. 2010.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collective imagination: Time, place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J]. *Symbolic Interaction*, 33(1): 96-114.
- David J. 2012. The possibilities for studying place names in relation to landscape, space and identity [J]. *Acta Onomastica*, 78: 28-45.
- Edensor T. 2012. Illuminated atmospheres: Anticipating and reproducing the flow of affective experience in Blackpool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0 (6): 1103-1122.
- Foucault M. 1986.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C]// Faubion J D.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New York, USA: The New Press: 349-364.
-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M]. Chicago,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A: 40.
- Jeffrey O K, Robbins J.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5-140.
- Light D, Young C. 2014. Habit, memor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socialist-era street names in post-socialist Bucharest, Romania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4(3): 668-685.
- Light D, Young C. 2015. Toponymy as commodity: Explo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urban place nam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3): 435-450.
- Rose-Redwood R S, Alderman D, Azaryahu M. 2010.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 (4): 453-470.
- Rose-Redwood R S. 2008. "Sixth Avenue is now a memory": Regimes of spatial inscription and the performative limits of the official city-text [J]. *Political Geography*, 27: 875-894.
- Schwartz B. 1996. 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 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5): 908-927.
- Shoval N. 2013. Street-naming,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flict: The case of the old city of Acre/Akko/Akka [J].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38: 612-626.

Changes in Nanjing street n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Ji Xiaomei¹, Cui Huifang¹, Tao Zhuomin^{2*}

(1. School of Tourism,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enerates a new sub-discipline called critical toponymy, which focuses on the dissection of the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s of naming or renaming and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place-name landscap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power competi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This sub-discipline gives an opportunity to account for the huge changes in the place-name landscape in China within the characteristic social context of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rapid urbanization. It makes use of knowledge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history, geography, management, linguistics, and folkloristics. As the produce and component of social memory,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memory theory to the research of toponymy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ut the role of social memory theory in toponymy has been overlooked for a long time. Meanwhile, place names have been consider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many cities take diverse measures to preserve them. However, social memory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ity, contemporaneity, and selectivity, which decide that not only the usage habitat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social groups can be ignored when naming or renaming place names. In other words, preserving historical place names and developing modern place nam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Apply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memory,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ynamic change of street names of the main districts in Nanjing City. It found that the most of newly-added street names distributed around the old urban area and the disappeared names clustered within the old urban area. The old south district has the highest density of both existent and disappeared street name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the then newly-added street names were mainly found in the area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of Xiaguan District and districts surrounded by the Ming Great Wall, and from the 1990s they scattered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old city districts. Since 1911, the government came to control naming rights; as time went by,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passivity of enterprises increased. The existing street names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surrounding residences, blessing, alien cultural sites, and natural landscape, which were not only inherited via the local culture of old districts, but also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e new districts. The street names based on religious beliefs, historical figures, economic activities, municipal facilities, and location in the city were more likely to die out due to the frequent change in social ideology and the city's functional space. The involvement of power and capital gave rise to many place names in modern style; the inertia of memory delayed the vanishing of old nam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mory propelled the evolution of place names.

Keywords: street nam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dynamics; social memory; Nanjing City